

情牽同行路 有日有月 —為李潼而作

民生報少兒童叢書主編 ◎ 桂文亞

汽車在山堅石硬、枝繁葉茂的北宜公路上奔馳。元月2日下午兩點半，宜蘭演藝廳有一場為李潼舉辦的「望天音樂追思會」，我們正是為此而來。

李潼遽逝的消息震動了兒童文學界，他是公認的「臺灣少年小說第一人」，這面迎風招展的大旗，豈可如此倒下！我們經得起這樣的損失嗎？

追思會上，祝建太和以誠、以中及以寬三個孩子在臺上讀詩三首以作送別，望著這一家人的沉著平和，讓人欽敬。我想，歷經人生這一路風雨，多情的李潼、驕傲的李潼、自尊自我的李潼、陽光燦爛的李潼，是絕不會允許身後留下一片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的。

祝建太不是這樣說的嗎？

「李潼因為作品、演講、文學營，與讀者文友結交很多善緣，朋友對他的真心、熱情令人感動，覺得他是幸運、有福報的人……」。

「感謝上天留了兩年半的時間使他完成很多心願，出版《望天丘》以及整理可以成書的文稿；多跟孩子接觸……」。

感謝因為有您一路相伴

使我們的人生道路上

盛開爛漫芬芳的花朵

充滿清朗的笑語

早在1984年，李潼即在《民生報》兒童天地版發表作品，1987年，首次出版他的兩本兒童小說集《大聲公》與《大蜥蜴》；1989年，出版少年小說《博士·布都與我》；1992年，出版散文集《這就是我的個性》，其後近二十年，陸續出版的作品包括：1997年散文《蔚藍的太平洋日記》；2000年少年小說《再見天人菊》；2001年兒童小說《天鷹翱翔》、少年小說《順風耳的新香爐》；2002年少年小說《綠衣人》；2003年少年小說《恐龍星座》、《望天丘》；散文《天天爆米香》及評論集《呼喚：李潼少年小說的聲音》（桂文亞主編）共計13種。

說來有趣，認識李潼雖有20年之久，彼此卻止於編輯與作者友善的君子之交，對於他那聞名已久的宜蘭老家，始終無緣親訪；但無論如何，我們相處得不錯。記得我兒小學畢業那年，李潼特贈錦緞襯底的一面紀念框，題簽「努力愛春華」，真是一筆好字；有一年，又得贈大兒子以誠做的一個泥塑小老人，可愛極了，保存至今。李潼為人周到熱情，編輯部同仁還吃過多次他寄來的宜蘭鴨賞和蜜餞呢。

李潼生病期間，一如往常，偶有聯繫，



但是我不相信他會病得那麼重，他是那麼有才華有活力的一個人啊。他的死，令人痛惜！

李潼作品自然是讀過比較多的，若問最喜歡那一本，答曰：《順風耳的新香爐》。當初讀的時候，是當作童話來讀，有人為它的文體感到困惑，其實不是問題。故事敘述的是臺灣東北角一個魚港小鎮媽祖廟裡的順風耳大神，因為不滿沒有屬於自己的香爐，決定離家出走另找一個，結果跌跌撞撞，鬧出不少笑話，還是回廟裡先安份守己再說。

綜觀李潼一生的兒童文學作品，其一貫的意旨即是「如何使少年兒童讀者獲益」，這「獲益」二字，就個人的解讀，是指李潼始終把「教誨」及「引導」少年兒童的心靈成長，作為作品的精神軸心。

譬如《順風耳的新香爐》，他藉著順風耳想當家作主的這一念頭，來完成「志氣和理想不光憑一時的行動，還得有本事」的「思想」的傳達，所謂（師者，所以傳道、授業、解惑也）。

李潼是一個充滿使命感的作家，他想對少年兒童讀者「善盡言責」，自許為少年兒童的精神導師，期望他們在關懷及點撥之下走向美好的人生，這一觀察，應該是沒有疑問的。在他1986年出版的兒童小說《天鷹翱翔》中，我們看到了他所傳達的「天鷹精神」；在1987年出版的兒童小說《大聲公》裡，讀到他頌揚的天真熱情與助人為樂；同年出版的《大蜥蜴》，收錄了24篇兒童小說，以〈外公家的牛〉和〈少年傀儡師〉為例，前者寫的是對老者與老牛的同情與關懷，後者則為臺灣的傳統技藝懸絲傀儡發聲，都是言之有物的鄉土作品。

對於文學寫作的體會，我是以三個高度做為「進階」，一曰語言的高度，泛指寫作者掌握語言的能力；二曰藝術的高度，意指真、善、美的詮釋意境；三曰思想的高度，即是作品的思想深廣，是否能通達生命哲學的最高境界。

任何一部好作品，都具備了這三種高度，任何一個寫作者，也都是這三種高度的終生探索者，然而說來容易，實踐何其不易。

這也是我想證明自己何以獨厚《順風耳的新香爐》的原因了。

幽默、質樸、明白曉暢，予人以鬆弛愉悅之感，李潼的這本《順風耳的新香爐》，不但和早期的《大聲公》、《大蜥蜴》一樣，散發著一種清純稚氣，又更穩健成熟些，它是

同時具備以上所說的那三種高度的，儘管也有它一貫的「道」，卻表現得很自然。然而讓我困惑的是，幾乎是前後時期出手的作品：《天鷹翱翔》與《再見天人菊》，「主題先行」的教育意味頗為超過了像《順風耳的新香爐》裡的那一種可貴的純真氣息，說實話，我倒寧可李潼的作品多一點幽默鬆弛，少一些文以載道。於是我想，寫作者的作品必然會隨著時代的價值觀及個人的經驗體會有所抉擇，李潼本來就是老師，在「教育正確」的前題下，兒童文學是否仍然擺脫不了「為教育服務」的理念？



此外，一旦兒童文學裡除了「教育正確」也傳達了作家的「政治正確」，對思想萌芽中的少年讀者來說，作家的作品是否需要更多的解讀與引導？

李潼 1989 的作品《博士·布都與我》，對少年讀者，開始產生了新的閱讀挑戰。評論者彭瑞金說：「發現野人固然是李潼虛構出來的懸疑、有趣事件，但作者有意無意地，也流露了對野人生活世界的嚮往心情。『尊重別人生活的內容與方式』不正是解開當今族群癥結的鑰匙嗎？」

張子樟也說：「這本小說雖以童年趣事為主，但李潼在敘述中，卻隱隱約約融入了族群關懷與現實批判兩大主題。表面上是熱鬧逗趣，骨子裡卻隱含批判與反思。」

出於對自己依存土地的關懷與護衛，加以有心挑戰傳統少年兒童散文的寫作題材，1997 年，李潼寫出了海洋紀實散文《蔚藍的太平洋日記》，其中一篇〈導向飛彈擊中三貂角海灣〉卻是傳達了李潼的政治關懷。然後我們無論是在「台灣的兒女」16 冊，亦或「噶瑪蘭」第二部曲，也就是李潼出版的最

後一部遺作《望天丘》中，都可以更明確感受到一個「深有歷史悲劇感的李潼」（班馬語）和「一個歷史感無時不在的李潼」（曹文軒語），是如何熱情的（甚至到刻意）把一隻筆當作一管槍，去「轟醒」臺灣子民的尋根意識——什麼人才是臺灣人？小說家李潼向自己也向歷史拋出這個不可迴避的議題。

我想說的是，李潼走得實在太早！在他的盛年，在這樣一個詭譎的盛世！他還有太多可思可感可寫，理當還有一段潛沉與修鍊的空間。這些時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：如果上天再賜李潼 20 年生命，那「看山是山，看山不是山」的境界會因此「看山又是山」了嗎？激情過後，歷史的規律與節拍會如同正常的鐘擺平靜來回嗎？

生命如渡海，行過波峰，進入激流，身為知識份子，一個忠於良知的文化人，能夠理性看待昨天的歷史與即將走進歷史的今天嗎？

李潼，留下 650 萬字的作品，歷史當然也會有公平論定的。

